

引语

光绪年间,王闿运受聘入川,主掌四川尊经书院。他在尊经书院迅速施行“息讼、禁烟、明礼”等管理举措,提倡通经致用,用经、史、词章之学来培育尊经书院的实学学风,设尊经书局刻书以化育诸生。在其掌教期间,尊经书院终被办成四川的模范书院。

# 王闿运：一代大儒的巴蜀之旅

文/蒋蓝

插图/孔祥辉



王闾运(1833—1916),字壬秋,又字壬父,号湘绮,世称湘绮先生,湖南湘潭人,清未经学家、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教育家。他是清咸丰二年(1852年)举人,曾任户部尚书肃顺的家庭教师,后入曾国藩幕府。光绪四年(1878年)十一月,王闾运入川,在成都主持尊经书院。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、衡州船山书院、南昌高等学堂。他曾授翰林院检讨,加侍读衔;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;著有《湘军志》《湘绮楼诗集》《湘绮楼文集》《湘绮楼日记》等。

### 结交“第一人”

钱钟书《石语》里记载,陈石遗对钱钟书谈及王闾运,认为其“人品极低,仪表亦恶”。“仪表恶”是指王闾运个子矮小;“人品低”,大抵是指他佯狂、倾心权贵,加之自视甚高。钱钟书也认为,王闾运早年《雪夜集》中的七言绝句,已不免是英雄欺人了,晚年的诗作纯属打油诗。才子论人,未及其余,这样的看法未必客观公允。诚如近代学者郑逸梅先生所言,近百年来,金声玉振、举世倾倒的王闾运被“施以五颜六色的打扮”。很显然,王闾运就是人们所说的“箭垛式的人物”。

王闾运的先祖明朝时从江西徙居于湖南省衡阳西乡,居住数世之后,搬到了湘潭乡下。王闾运在少年时候就成为孤儿,由叔父抚养长大。据说,他自幼资质愚钝,但是十分好学,颇得塾师蔡先生赏识。王闾运苦学,蔡小姐早已属意,蔡先生旁观者清,不由得心中大喜。蔡小姐名菊生,知书达理,能诵《楚辞》,有咏絮之才。据王闾运本人所叙,他与蔡菊生订婚当夜,梦见庚帖上写着一个“媿”字。婚后,他以“梦媿”为蔡夫人的别字,足见才子的敏捷。

清末湖湘文化名人中,最为特立独行者,当非王闾运莫属。王闾运的一生颇为光怪陆离。清末笔记中有“一个半湘潭举人”的说法:“一个”指王闾运,“半个”指左宗棠。左宗棠在当婚之年,入赘湘潭周氏,在周氏桂在堂居住十年有



王闾运画像

余,女婿历来被称为“半子”,所以称“半个”。王闾运、左宗棠两人成就在文、武两道,均璀璨至极。王闾运有恩于左宗棠,而左宗棠素来厌烦文人,尤其不喜欢游走于权力之间的王闾运,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,成了清末官场的一道景致。

王闾运从25岁到55岁这漫长的30年中,文名惊世人,见识撼官场。他25岁中举,结识了“湘中第一人”曾国藩;随后结交了“朝中第一人”肃顺;进入四川后,结交了“川中第一人”丁宝桢。王闾运与有些文人谄媚奉承不同,他是反其道而行之。所谓“见大官则藐之”的战术被他运用得十分娴熟,既要卑不亢,又要让官场对自己的学识产生“饥饿感”。其原因在于他学问充实于心,浩然之气充实于心。王闾运曾在日记中写下一段文字:达官贵人穿着金貂皮,平头百姓想见他们,必须打通各种关节,就像一条狗钻入金貂群中,忍受别人的冷眼。袁枚有诗“金貂满堂,狗来必笑”说的就是这回事。可见,王闾运对此早有心理准备。

王闾运考中举人后,进京参加礼部考试。王闾运的同学龙汝霖当时受聘为户部尚书肃顺的家庭教师。经龙汝霖引荐,肃顺见识了少年老成、志在社稷的王闾运。肃顺是郑亲王第六子,少年时纨绔无赖,成年后金盆洗手,有澄清天下之大志。在大臣中,他敢于任事,铁面无私,深得咸丰皇帝的信任和倚重。有见于清末时局困厄,肃顺主张延揽天下精英,不分满汉,唯才是举。

有一次,王闾运为肃顺代写奏折,咸丰皇帝看了叫好,就问肃顺是谁写的。肃顺有心推举,回答是湖南举人王闾运。咸丰皇帝问这样的人才为何不出来做官,肃顺说此人心志太高,不是

穿貂的官不肯做。当时，翰林院官员才能穿貂。咸丰皇帝说，这有何难，就赏他穿貂！但王闾运认为这是出于恩赏，“自视甚高”者不能轻易放下身段，就没有接受。

王闾运深知，肃顺好谋而缺智，刚直而乏柔，终究难成大事，自己若一门心思绑在这棵树上，很可能被殃及池鱼。于是，他听从好友严正基的规劝，托故去山东云游。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，以肃顺为首的8位“顾命大臣”，一股脑儿成了刀下之鬼。肃顺被杀后，人人都想撇清与他的关系，王闾运并非忘恩负义之徒，说：“人诋逆臣，我自府主！”话很明白：人人都说肃顺是逆臣，我却认他为“府主”。虽然是事后评论，但足以显示王闾运的异见。

### 王闾运入川

光绪四年(1878年)十一月，四川学政张之洞说服四川总督丁宝桢，由他出面聘请王闾运入川，担任四川尊经书院山长，王闾运同意了。

官场人士总是渴望利用亲上加亲来拧成一股绳。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期间，王闾运将自己的第七女王莪，许与丁宝桢的第八子丁体晋。何人作媒？乃是时任云南提督唐友耕(号帽顶)！这事在《湘绮楼日记》光绪五年(1879年)十一月一日的日记里有明确记载。

王闾运与一省总督就此成为亲家，并由此保持了与四川大员的紧密关系。王闾运总是目

光如炬，审时度势，献言献策，张之洞每年白白奉送六百金与他，丁宝桢、刘岷庄都有同样的举动。因此，王闾运在成都与湘潭之间奔波，也是生活得有滋有味。他的日记充斥了宴饮、打牌、玩乐的闲适生活记录。

丁宝桢任湖南岳州(今岳阳市)知府时曾延请王闾运入幕，但王闾运因故未至。后来，王闾运在信中谈起此事不无愧意：“前临鄙郡，辱荷知延。荏苒一纪，久疏民敬。”丁宝桢对王闾运极为敬重和信任。王闾运曾云：“闾运在蜀，危行高谈，颇不便于道，以公宽仁，乃有直绳之客；羊质虎皮，终当遭射，幸无官守，亦不必以保全累明公也。”可以想见，丁宝桢曾有过荐举王闾运的想法，但王闾运谢绝了。

王闾运在《湘绮楼日记》中说：“自院外生者，人品以帽顶为最优，议论以帽顶为可听，殊为可慨。”为什么“殊为可慨”？显然，读书人早已言语无味，而武人以生活的本味直指人心。王闾运在尊经书院之外的交往中，唐友耕是最佳人选。唐友耕的人品能得到一代大儒如此好评，确属难能可贵。

反过来看，唐友耕演绎出的与石达开的战事，也丰富了王闾运《湘军志》的内容。

王闾运不但游历了乐山、五通、夹江、眉州、宜宾等地，成都周边的景点也一一驻足，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。至于成都的名胜古迹，诸如洗马池、欢喜院、少城、浣花溪、锦官驿等等，自然也不会错过。

王闾运曾经为杜甫草堂工部祠撰有一副对联：

自许诗成风雨惊，将平生硬语愁吟，开得宋贤两派；

莫言地僻经过少，看今日寒泉配食，远同吴郡三高。

这是一番实打实的赞美辞。王闾运赞美杜甫道：一生忧怀家国，写下了多少“惊风雨，泣鬼神”的作品，都是杜甫发自肺腑的愁吟硬语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沉郁苍凉的风格，影响到宋朝



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

诗坛，开创了江西诗派以及剑南诗派，多少人继承你的创作传统；草堂早不复当年面貌了，如你所慨叹的那样地僻村幽，无人拜访，看看今天，追崇你的诗人黄山谷、陆放翁，已经配享在你的祠堂里，一同受到后人祭扫，远胜苏州的三高祠，声名远播，佳话流传。

这当中，溢美之余，显然暗含王闿运奔波半生、如今置身偏僻西蜀的无限感慨。

当时，担任云南提督的唐友耕得到骆秉章特许，一直居住于成都，有权有势，自然不会放过陪同名人“走一遭”的绝好机会，而且他具备“分忧”的能力。

王闿运在日记中记述：

“出城赴稚公草堂之约，城外泥淖，秋色无可观，唯溪水涘涘颇有凉意，无端感触，咏‘出门望佳人，佳人岂在兹’之句，正不必情事副风景也。至少陵祠，幕客至者九人，武有帽顶，文则馆师，为二客也，稚公二子均从，唯见其小者。中饭微雨，菊瘦而高，殊不及湘中。”

从行文可知，唐友耕并不在王闿运邀集的人当中，而是强行加盟的“客人”。我估计唐友耕之所以执意前来，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请王闿运吃饭，以便得到教益。在王闿运心目中，能够与他交谈的人甚少，“唯稚公、季怀可谈”，可惜知己并非能时时见面，他显得兴味萧索。再出成都南门，至宝云庵，访百花潭，王闿运终于在二仙庵遇到了尊经书院学生16人。学生对老师十分尊重，他心情好转，当场赋诗：“澄潭积寒碧，修竹悦秋阴。良时多欣遇，嘉会眷云林。”



岳麓书社出版的《湘绮楼日记》

不知道在这儒者云集的场合，唐友耕有什么表现。但从《湘绮楼日记》可知，自此以后，王闿运与唐友耕之间的往来逐渐增多，后来几乎达到隔一两天必有一晤的程度。王闿运办事路过唐府，也要进去稍坐片刻，歇息一番，喝几盏茶再走，已到十分惬意的地步了。不久后，唐友耕升为四川提督，王闿运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写点东西了。

王闿运在赠诗前的“题记”里写道：“四川提督久阙实任，牙门荒芜。唐新建旗竿（杆），因题为贺。”并作绝句二首。

朝廷对唐友耕的提督任命是在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初春下达的，唐友耕立即在提督府门前立起了壮硕的旗杆，可以想见他是何等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。在《湘绮楼诗集》里，这两首绝句的标题是“旗竿（杆）二首”。诗里均以马为喻，暗示唐友耕脚下所指示的方向有多个，也就是将面临多个叉道。这分明是一种警策，只是不知道唐友耕能否在春风得意之际，明白脚下蛰伏的危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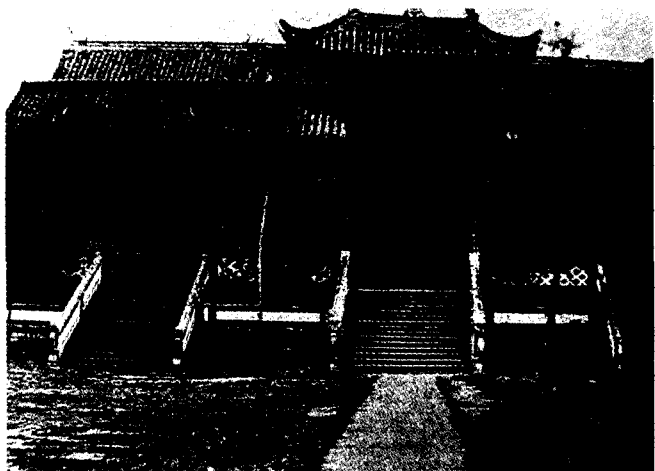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亲戚，王闿运与总督丁宝桢无话不谈。他在一封致丁宝桢的信中说：“公与闿运，皆一时不可多得之人才。”说的真是实话。

有一次，王闿运与丁宝桢同游，夜宿合江县，眼前水波荡漾，水天一色。古人心性天真，他们谈及志向，丁宝桢问王闿运：你的志向如何？

王闿运答：少年时代仰慕鲁仲连义不帝秦的高义为人，如今我年齿渐老，志在做申屠蟠那样隐居田园的学问家。

丁宝桢笑道：我生平颇以诸葛孔明自许，但愿能做到张居正那样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从性格、行事风格而言，丁宝桢确实与明朝万历年间的铁血宰相张居正颇为相似。丁宝桢是难得的务实之人，更有一般官员不具备的长远眼光。丁宝桢已洞悉了英国人窥伺西藏的心机，他请王闿运入川办学，就是想多多储备人才。对于这一点，王闿运看得一清二楚，他向丁宝桢献了一道万全之策：印度与英、荷是宿世之



尊经书院旧照

仇，现在我们可以趁着西藏无事，多补充兵员，作为印度的坚强后盾，印度既已结援于中国，就会拼死抵抗英、荷的侵袭，成为西藏牢不可破的屏障。丁宝桢对这一策略“大称善”，并说：“印度必为战地，英人谋出緬、藏，欲建重镇于藏内，设谍孟拉间以边防。”丁宝桢立刻将这一策略付诸实施。可惜天不假年，他因操劳过度而遽然病逝，宏伟的计划也成为泡影。

丁宝桢去世时，王闿运 55 岁，非常伤感。既叹命运偃蹇，又感知己凋零。他在《祭丁文诚谏》中感叹道：“慎忧辱之无臣，每对食而忘餐，思环海之受兵，若群蚁之围蛄。时冉冉而多留，老浸浸其欺人。谓圣贤之无如何，增志士之酸辛！”

### 纵横计不就

张之洞出面，集资在成都文庙西街西侧南校场附近的石牛寺旧址上修建尊经书院，于光绪元年(1875)春季建成开学。校址选择于此，主要原因是这里在明朝就开办过书院，其次是与教育圣地文庙前街以及公馆林立的西街相邻。

入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，王闿运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心得：“治经于《易》，必先知易字含数义，不当虚衍卦名；于《书》，必先断句读；于《诗》，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，不足以颂学官，传后世，一洗三陋，乃可言《礼》。《礼》明然后治《春秋》。”又说：“说经以识字为贵，而非识《说文解

字》之字为贵。”“文不取裁于古则亡法，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。”当时蜀学蔽塞，亦步亦趋，更无通儒，听到王闿运的这些议论，学生才知道如何研诵注疏诸史文选。

初来乍到，王闿运在尊经书院迅速施行“息讼、禁烟、明礼”等管理举措，使尊经书院院风得以根本改变。王闿运提倡通经致用，用经、史、词章之学来培育四川书院的实学学风，设尊经书局刻书以化育诸生。在其掌教期间，尊经书院终被办成四川的模范书院。尊经书院的办学方式，开四川书院改制风气之先，促进了四川书院的发展。

王闿运把《湘军志》书稿带到了成都予以修订，此书稿因被曾国荃认为轻诋湘军及曾国藩而遭毁版，后由尊经书院的学生出资重刻。王闿运尊经书院弟子中，涌现出了刘光第、廖平、宋育仁、吴之英等俊杰，以廖平学术成就最大，但廖平远非王闿运喜欢的学生。廖平口讷，曾漏夜抄写宋人之作，而王闿运尽管早年抄写过《二十三史》，但后来是不屑于此道的。有人给王闿运送去一个婢女，王闿运在日记里就有“况氏送来一婢，神似井研廖生。年十五矣，高仅三尺，即挥之去”的记载。有人推荐廖平管理尊经书局，王闿运也不同意。廖平晚年曾经这样评价王闿运：“湘潭长于文学，而头脑极旧，贪财好色，常识缺乏，而自视甚高，唇吻抑扬，行藏狡狴，善钓虚誉。故其学说去国家社会最远。远则遨游公卿，不为所忌，依隐玩世，以无用自全。”学生对老师竟然有这番评价，足以看出彼此误读之深。

王闿运临终前，为自己作了一副挽联：“春秋表仅成，赖有佳儿习诗礼；纵横计不就，空留高咏满江山。”前一联有自我安慰之意，说晚年能够以教书授徒为乐，后一联是慨叹自己的才学不见用于世。是否如此，不得而知。

1916年10月20日，83岁的王闿运无疾而终。❶

(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)